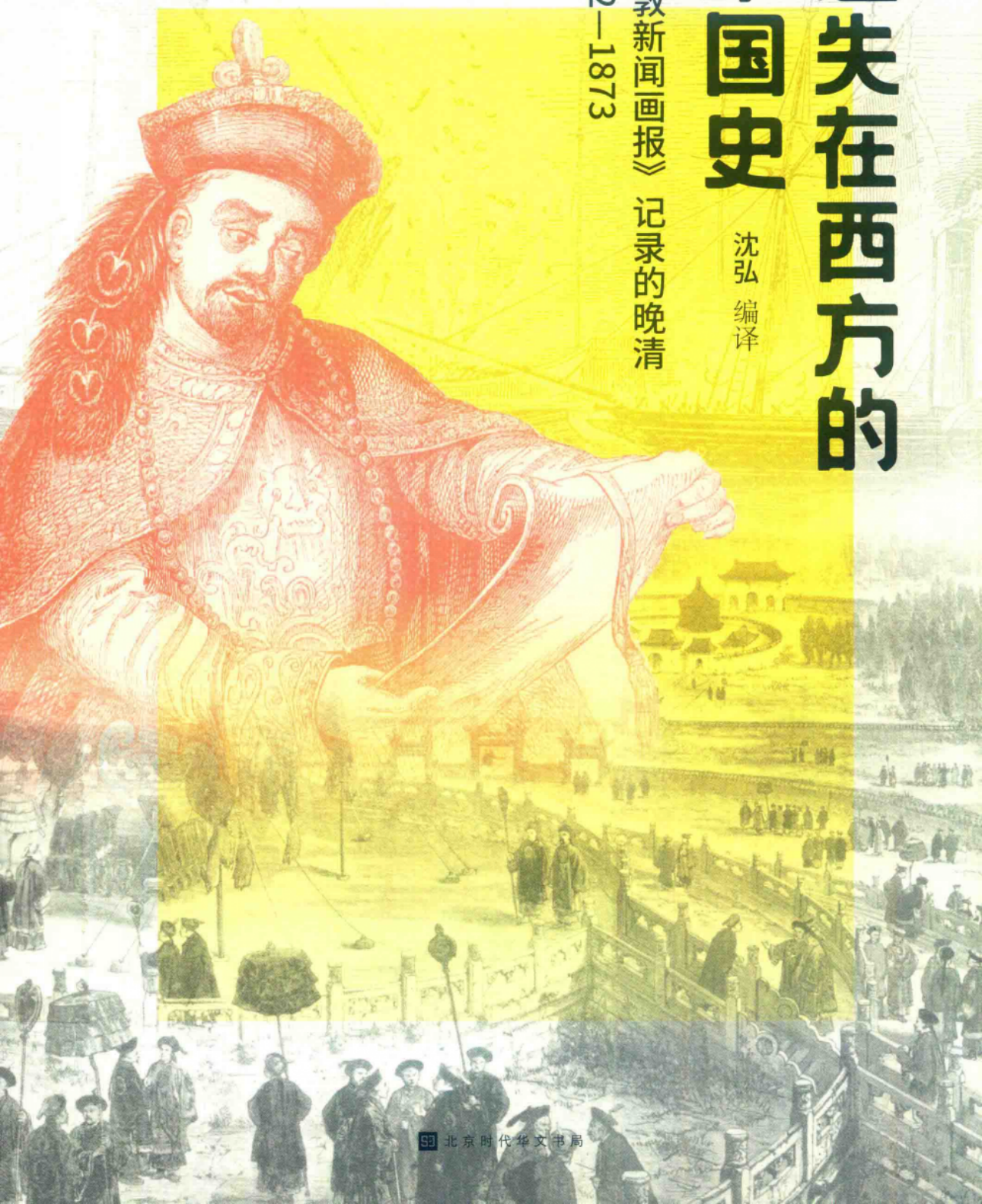


# 遗失在西方的

# 中国史

沈弘 编译

《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  
1842—187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1842—1873 / 沈弘编译. — 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1.10

ISBN 978-7-5699-4440-2

I. ①遗… II. ①沈… III. ①中国历史—史料—清后期—图集 IV. ①K260.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1) 第 205280 号

##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 1842—1873

YISHI ZAI XIFANG DE ZHONGGUOSHI : 《LUNDUN XINWEN HUABAO》 JILU DE WANQING 1842—1873

编 译 | 沈 弘

出版人 | 陈 涛  
策划编辑 | 余 玲  
责任编辑 | 丁克霞  
执行编辑 | 李唯靓  
责任校对 | 陈冬梅  
装帧设计 | 程 慧 王艾迪  
责任印制 | 瞿 敬

出版发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8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100011 电话：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10-5224988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 43.5 字 数 | 950 千字  
版 次 | 202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2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4440-2  
定 价 | 19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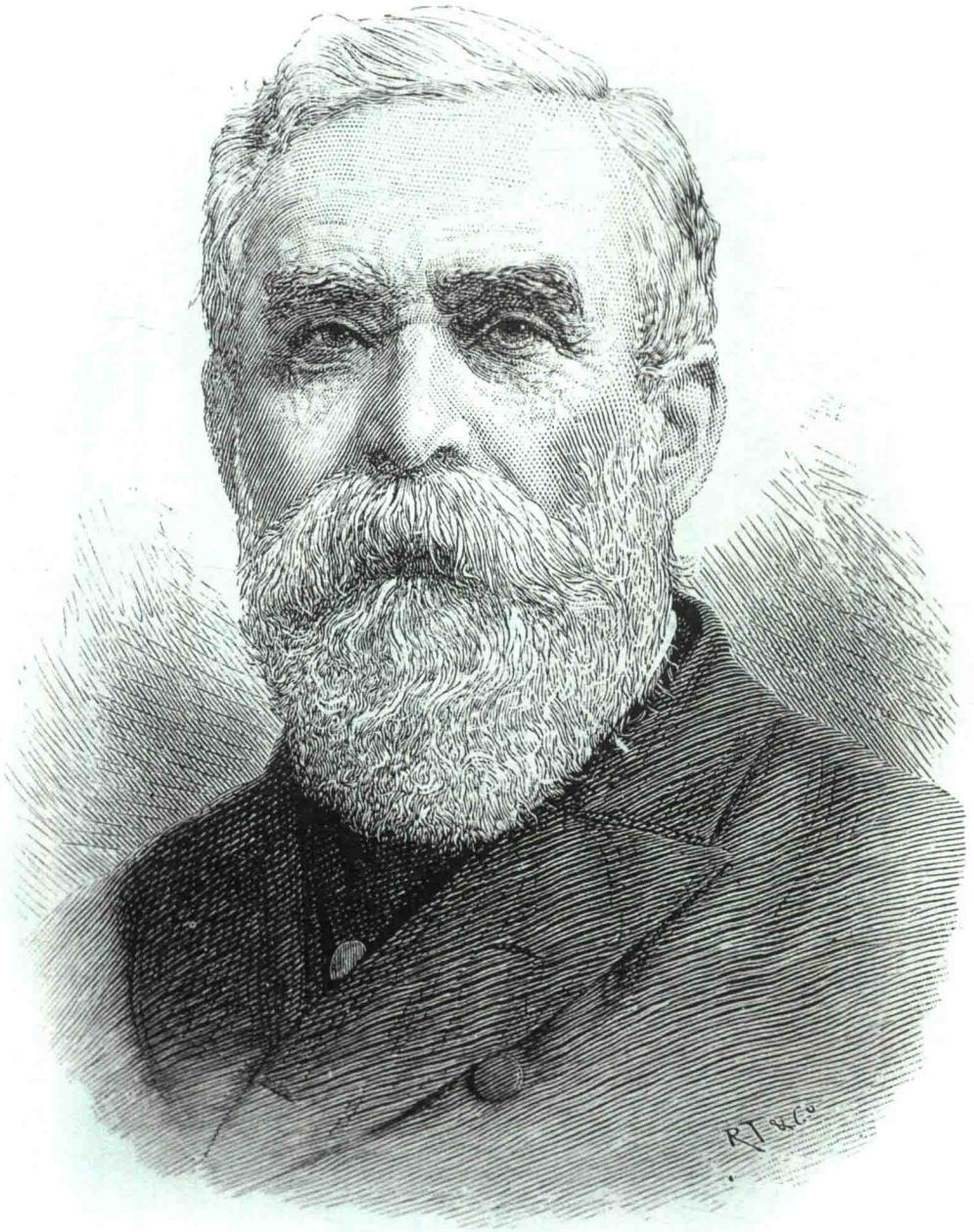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伦敦新闻画报》创始人赫伯特·英格拉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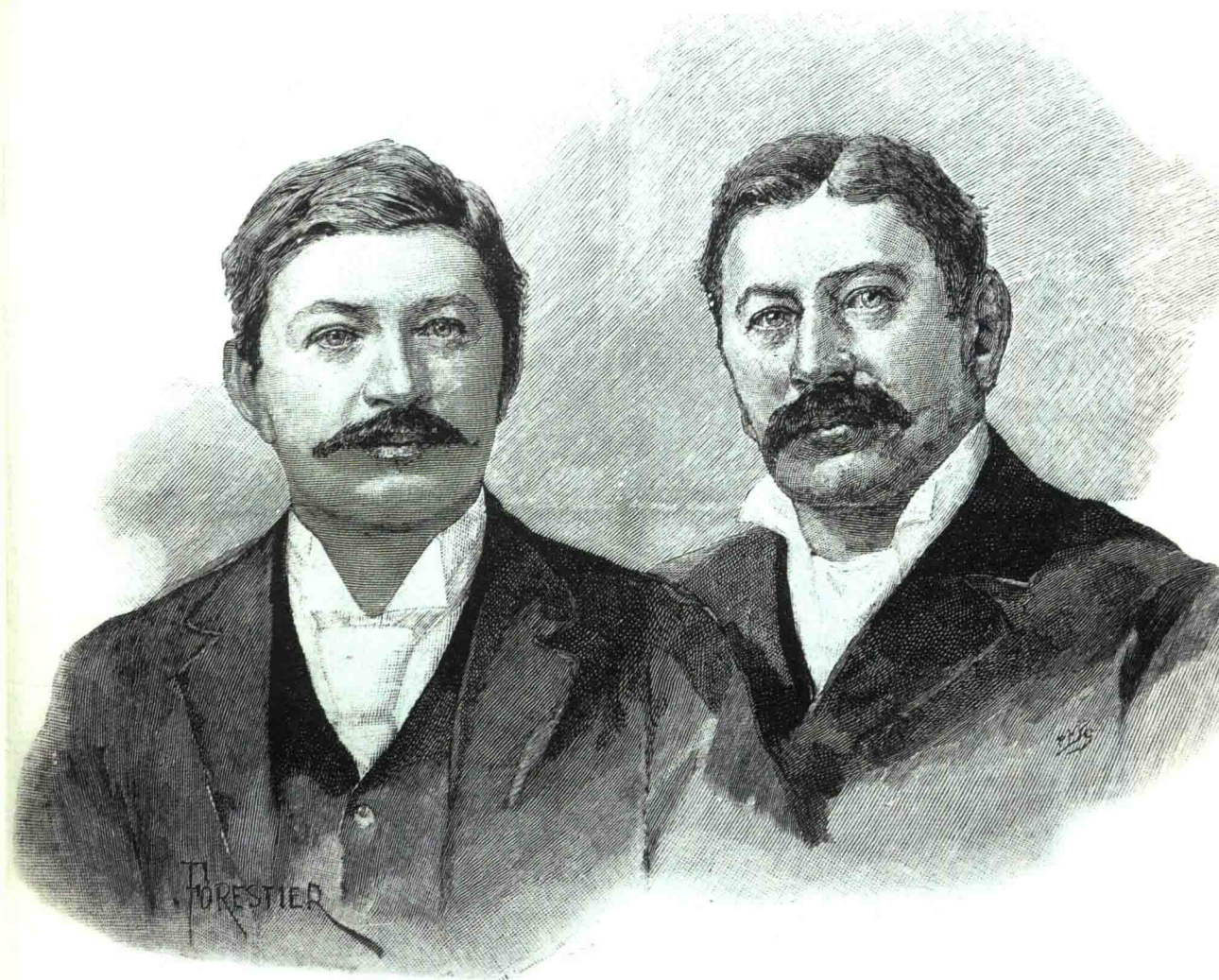


英国著名画家约翰·吉尔伯特爵士，他用自己的生花妙笔撑起了《伦敦新闻画报》在创办初期的半边天。在创刊期所包含的20幅插图中就有8幅是出自吉尔伯特之手



MR. MASON JACKSON.

英国著名画家梅森·杰克逊，担任《伦敦新闻画报》艺术编辑长达 25 年之久。凭借他发明的先进的雕版技术，《伦敦新闻画报》得以在 19 世纪后半期各种新闻画报层出不穷的激烈竞争中始终稳坐钓鱼台，保持其在业界的龙头老大地位



MR. WILLIAM INGRAM.

MR. CHARLES INGRAM.

THE MANAGING DIRECTORS OF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英格拉姆的次子威廉和三子查尔斯均曾为《伦敦新闻画报》的高管



MR. W. SIMPSON, R.I.

英国著名的写生画家和战地记者威廉·辛普森，曾被派往 40 多个国家去报道那儿的战争、风土人情和其他重大事件。1872 年，他被派往中国报道同治皇帝的娶亲婚礼，该系列报道在英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使得西方的“中国热”再次急剧升温



MR. JOHN SCHÖNBERG.

奥地利画家和驰名欧洲大陆的战地记者约翰·肖恩伯格。他是《伦敦新闻画报》为了报道北京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进攻北京而于1900年被派往中国的。他到达北京之后，发回了数量惊人的速写图片和文字报道



MR. JULIUS M. PRICE.

《伦敦新闻画报》记者朱利叶斯·M. 普莱斯，他是被派到中国报道中法战争的



MR. R. CATON WOODVILLE, R.I.

《伦敦新闻画报》记者R. 卡顿·伍德维尔，他来中国主要是为了报道甲午战争



**MR. MELTON PRIOR.**

《伦敦新闻画报》记者梅尔顿·普莱尔，他在华的时间是1899年，即在1898年戊戌变法之后和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前

## 出版说明

《伦敦新闻画报》是公认的世界上最早的以图像为主的画报。其以细腻生动的密线木刻版画和石印画，以那个时代的技术条件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再现世界各地的重大事件。画报创办初始就对中华帝国表示密切关注，派驻大量画家兼记者，仅1857年至1901年就向英国发回了上千张关于中国的速写和几十万字的文字报道。它给当时的西方读者讲述了一个个发生在遥远中国的故事，也为后来的历史爱好者们描绘出近代中国众多大事件的珍贵片段，提供了绝无仅有的史料。这也正是它的弥足珍贵之处和它的出版价值所在。

一、本书为《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系列第一辑，通过本次增订，共收集1842年至1877年间《伦敦新闻画报》上200多篇与中国相关的报道，近500张版画。需要指出的是，其中几篇报道如“去中国的路上”“马尼拉速写”系列等，虽未与中国直接相关，但翔实地记录了那时的记者们是如何前往中国采访的全过程，所以译者和编辑一致认为也应将它们收录其中。

二、编排上每年为独立一章，小节按照英文登载时间先后排列。小节标题使用中英文两种文字，英文依照原刊录出。此外，为尽可能呈现原文风貌，本书小节标题以及正文中出现的页码均依据原文未做变动。

三、为了保证图像的精美，书中做了简单的上色处理。图注均依据原刊的英文图注编译。

四、由于原作者与我们所处的立场不同，思维方式和观察角度不同，因此本书对于某些具体历史细节的描述和解释，与我们通常的说法或有出入，有的甚至把列强侵略行径、强盗罪恶说成是造福救助，这自是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陈词滥调。报道中对某些具体历史事件的细节描述，不符合我们关于这些历史事件的定义和认知，如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火烧圆明园等，这些都是当时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罪恶行径，但因原报道记录者所处立场不同，描述时多对这些行为进行了美化。为尽可能保持原作原貌，对此译者和编辑未做很大改动，但这并不代表我们认同这些说法，也请广大读者在阅读时注意鉴别。

五、可以肯定在同时期载有中国图文的西方书刊中，没有一种可以同《伦敦新闻画报》等量齐观。如今我们将这一宗他者所描绘的中国图文呈现在读者面前，希望引起更多读者的兴趣和关注。限于条件和编辑水平，难免有疏漏和错误，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在此，一并感谢沈弘老师为我们从大洋彼岸搜集回来这些珍贵的史料，并亲自笔译全部文字，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相信此书的出版一定会受到对中国史感兴趣的爱好者的欢迎。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 再版序

沈弘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 1842—1873》（三卷本）出版至今已经有七年多了。承蒙读者的支持，此书在豆瓣上评分为 8.1。北京时代华文书局现在再版此书，除了在新版中纠正旧版中存在的一些错误，更换一些质量更好的图片之外，我还补充了一些以前遗漏掉的中国报道。过去这几年中，当赴国外图书馆做研究时，我确实专门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但可惜的是做得还不太彻底。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还是花在了收集、整理和翻译《伦敦新闻画报》1874—1926 年间报道中国的材料上了，因为这一时间段的中国报道迄今尚未正式出版。

关于在第二版中新增添的一些历史资料，我可以把下面这几篇比较有意思的关于中国的报道推荐给广大读者。

众所周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从圆明园抢劫到艺术珍品中最珍贵的精华部分被两军统帅所瓜分，准备献给各自的君主。迄今为止，大量的圆明园文物仍然藏在法国的枫丹白露宫内，可供人参观；而英国

那部分理应藏于维多利亚女王当时居住的温莎城堡、白金汉宫或奥斯本宫内，但是这批圆明园文物至今深藏不露，未见得有人提及。

然而根据《伦敦新闻画报》的中国报道，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温莎城堡就收到了不少来自中国的战利品。例如在 1844 年 1 月 6 日一篇题为《温莎城堡里的中国战利品》的报道，提及英国皇家海军军舰“复仇女神号”的海军军官们把一批从中国缴获的武器赠送给了居住在温莎城堡里的女王陛下：

这批武器战利品中包括了一些样式非常漂亮的火绳枪，其长度分别为 5 英尺、5 英尺 11 英寸、6 英尺 6 英寸不等；还有一支 4 英尺长的大口径前膛枪和一门 2 英尺 8 英寸长的火炮，这后两者都是以爱德华三世时期环形枪（炮）的方式制造的。另外还有一些 4 至 6 英尺长的长柄刀剑，并且长柄上缠有布带或刻有锯齿形凹痕，以便于手持武器者能抓得住长柄；其他还有一些装有现代防护装置的双刃

直剑。这些武器的外观、火绳、吊钩、韧度、刀口等均显示出工匠们对于枪炮的制造和刀剑的锻淬已经掌握了相当可观的实践知识。

从这篇报道的插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批武器的制作确实精美异常，达到了博物馆文物级水准。

在1844年1月20日的另一篇题为《送给女王陛下的非同寻常的礼物》的报道向我们透露了更多的消息：

女王陛下正在收到越来越多的中国礼物。两周前，我们曾有幸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了温莎城堡中的一批军事战利品。但在本期中，我们将荣幸地向读者们展示收藏在白金汉宫的，其价值远胜于那些武器战利品的一些中国艺术品。实际上，它们堪称是迄今已经运到英国的，有关天朝文明的最佳艺术精品。它们包括一口巨大的钟和一对花瓶，这两者都是从宁波的一个寺庙中所获得的。

记者对于这些礼物赞不绝口，因为那口大钟高达5英尺，直径3英尺，其形状酷似莎士比亚笔下描绘的风铃子，堪称效法自然，趣味高雅。而且它是用锡、铜、银为主要成分的合金所铸成，故音质宏亮，可传至数英里之外。钟的外表完全被铭文和浮雕所覆盖，根据其中一条藏语铭文的说法，该钟铸造于道光十九年，即1839年，并且是由该寺庙或绍兴府的人主持铸造的。

那一对花瓶跟这口钟一样，也是用金属制成的，这显然是指花瓶的制作采用了著名的景泰蓝工艺。两只花瓶的外表分别被一条蟠龙所缠绕，其造型精美，栩栩如生。

如果说上述这篇报道应该引起宁波和绍兴两地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爱好者关注的话，那么下面这篇报道便足以颠覆中国近代的留学史记载。

1848年4月22日的一篇题为《中国青年》的报道详细描述了三名中国青年在英国教会学校中留学，并因学业优秀而被引荐给维多利亚女王的经过。这三位分别名叫李金林（Lee Kim-lim）、宋户剑（Song Hoot-kiem）和翁孟寿（Ung Mun-sou）的小伙子原是英国伦敦教会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在英华书院的学生。1842年，香港被割让给了英国，理雅各便随伦敦会从马六甲去了香港。他原本想把他在英华书院所教的一班六名学生都带到香港去，可无奈那些学生的家长都死活不同意，结果只能作罢，只有已被他收作义子的翁孟寿始终跟在他的身边。一年后，理雅各听说李金林和宋户剑因学业中断和思念老师而伤心欲绝，便请新加坡的一位朋友做出安排，让他们坐了两千海里的船来到了香港。1865年，理雅各因身体不佳，想回英国休养一段时间，征求学生意见时，他们都表示愿意跟他一起去英国。

于是他们便于1846年4月抵达了英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就在理雅各博士父亲位于苏格兰亨特利的家中住了下来，并定期地就读于当地的教区学校。他们在那儿的普通教育和宗教教育都是由牧师希尔先生负责的。后者证实这些孩子行为举止彬彬有礼，使他们赢得了老师、同学的喜爱，同时也使他们得到了城镇居民的普遍喜欢。他们在各门功课上的进步令人满意，他们的举止无可挑剔，而且他们对于《圣经》可以倒背如流，以至于使他们成为了皈依基督教洗礼的合适对象。他们果然中

请了洗礼，并于10月15日在亨特利参加了由理雅各和希尔共同主持的洗礼仪式，前者用汉语主持，而后者则用英语主持。很多人出席了这一洗礼仪式。据称，那场面令人印象深刻。

经过了近两年的留学生涯，这三位中国留学生，即将跟老师理雅各返回香港。就在他们准备要动身之前，莫佩思子爵把他们一行都引荐给了住在白金汉宫的女王陛下和阿尔伯特亲王殿下。无论女王，还是亲王，都对这几位中国青年表示出了很大的兴趣，并且问了许多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理雅各博士都很高兴地给予了答复。女王接见中国留学生的消息据称在英国引起了轰动。可是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人对此一无所知。

1851年12月13日的一则消息是有关英国伦敦会(London Mission)从上海派人去开封调查那儿犹太人定居地的。此行证实了关于犹太人定居地的传闻，并且带回了《旧约》前五卷的希伯来语卷轴文本和开封主要犹太人家族的谱系表格。由此证实，那些犹太人的祖先早在基督元年前后就已经来华了。

1853年12月10日的《伦敦新闻画报》上刊登了一张号称是天地会成员证书的插图。天地会又称洪门，是明末清初一个旨在反清复明的地下秘密组织。天地会成员证书就像是一张正方形的招贴画，上面画满了神秘的符号、图像和典故。外行人很难看出其中的门道。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揣摩一下英国人对此进行的阐释。

对中国文物和工艺品感兴趣的读者还可以关注一下1869年3月6日和1870年7月9日《伦敦新闻画报》中的两篇报道。前者是有关一个中国景泰蓝香炉的坎坷命运。这个制作异常精美的景泰蓝精品是被英国公使阿礼国夫人从北京琉璃厂买走，后来在英国拍卖时，又被比利时国王的代理人所买走，成为比利时王室的财产。后者是关于英国南肯辛顿博物馆借展展品中一个柄上系着烟袋和扇套的中国乡绅扇。推荐这两篇报道的主要理由是文章中的铜版画插图很美，它们就像照片一样准确地反映出了中国文物的造型高雅和制作精美。

开卷有益，我相信每一位有心的读者在阅读此书时，随时随地都可发现意外的惊喜。

## 在西方发现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马勇

中国文明原本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不会排外。因为中国文明如果具有排外的因子，那么所谓的中国文明至今应该还在黄河中下游某一个地方徘徊。从历史主义观点看，中国文明具有不可思议的包容性，一切异质文明因子都会被中国文明接纳、重组与吸收，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渐渐成为不可须臾再离开的组成部分。这就是中国文明的固有所本性。

但是到了近代，中国问题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文明曾经在历史上包容、吸纳了本土的异质文明因子，比如周边族群的“胡文明因素”，也曾接纳域外文明印度佛教。更厉害的是，经过八百年磨合，到了唐末宋初，原本纯粹的印度佛教文明，竟然完成了“中国化”改造，竟然衍生出一个“中国佛教”，竟然有了一个与印度佛教关联并不太大的禅宗。凡此，都是中国文明的奇迹，也是中国文明不会排外的证明。

中国文明排外还是后来的事情，与中国文明、

印度文明完全不同的西方文明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文明也没有排斥西方文明。假如我们回望过去两千年中国与西方的接触，可以看到中西之间的交往，可能远超出我们后来的想象。秦汉帝国已经与西方往来，后来的丝绸之路实际上已经到了纯粹西方的边缘地带。至于元朝，尽管与唐朝一样，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中原王朝，但在中国的历史序列中，我们并不会排斥元朝，甚至以为元朝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元朝的征战固然给东西方带来一些灾难，但中西文明在那个时代确实出现过一次为时不短的正面接触。

那么，中国文明究竟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让我们面对西方的时候有一种被欺凌、受伤害的感觉呢？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课题。大致上说，应该归咎于满族人的统治。满族人入主中原的时候，毕竟面临着汉化、西化双重压力，满汉之间的心理纠结几乎始终困扰着满汉这两个大的族群。清朝在

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内部原因而没有延续明朝中晚期与西方文明坦然交往的历史。

而清朝的早中期，也就是17世纪、18世纪的时候，正是人类历史发生突飞猛进变化的时期，中国在满族人的统治下闭关锁国断断续续不过一百多年，当中国再度面对西方的时候，此时的西方已经不是原来的西方了，中国与西方从原来的异质文明变成了两个时代的文明。中国文明还是一个纯正的农业文明形态，而西方文明已经在这两个世纪变成了工业的、商业的，也即近代的文明。

两个时代的异质文明并不构成交往的障碍，中国如果在那个时候——准确地说在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时候——打开国门，开放市场，中国肯定会经过一场阵痛，但中国必然会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增加一个工业的、商业的文明，一定能够像几百年前接纳印度佛教文明一样，重建一个新的文明形态。

然而，历史没有办法复盘。聪明绝顶的乾隆皇帝就是不愿接纳西方，不同意与西方——其实那时也就是英国——构建一个与“朝贡贸易体制”不一样的近代国家关系，不同意让“红毛番”进驻北京，不愿意与西洋人同城。

乾隆皇帝的失误不是使中国继续自外于世界多少年，而是使中国问题越到后来越复杂。中西之间不能构建和平的近代国家关系并不意味着中国重回铜墙铁壁的桃花源，中国事实上始终就没有完全终止与西方的贸易交往，一口通商始终存在，非法的贸易更是朝野皆知，甚至自得其乐，自以为聪明。

非法贸易让中国错过了和平转型的机会，中国

没有办法接续明代中晚期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走上一个新的时代，更没有办法完成产业转型、市场开发，没有办法打破“四民社会”，重组社会结构。

中国在被动中日趋被动，特别是贸易失衡之后的鸦片贸易，不仅将人工营造的“康乾盛世”打回原形，而且使中国在那个时候渐渐有了一种被欺凌的感受。如果我们仔细体会林则徐1839年的言论，就应该承认林则徐的广东之行并不是鲁莽，也不是不懂贸易规则、不懂世界，而是一种忍无可忍的抗争。

林则徐的广东之行如果以胜利结束，相信中国或许能够从头开始，接纳西方，重构中西关系。或者，林则徐如果能像蒋廷黻的另外一种设想，彻底被打败，一败涂地，中国在那个时候或许就会猛醒，就会变革，就像二十年之后中国所走的路。无奈，中国在经历了两年断断续续的战争后，签署了一个《南京条约》，五口通商，中国又回到宁静的农业文明形态中去了。

到了1860年，中国再一次被英法打败，中国与英、法、美、俄等大国相继签署了《北京条约》，中国终于醒悟，终于迈出了走上世界的步伐。

中国人的活力，中国文明的接纳力量，都是不可思议的强大，短短几十年时间，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如果从1911年回望1860年，中国的变化就是不可思议，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政治架构，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但中国的天、中国的地，都与几十年前完全不同了。中国从传统走到了现代，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已经接纳了一个工业的、商业的文明，一个全新的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那时的中国人终于实现了“世界各